

正在上映的电影《人生大事》猛一看题材非常窄众,却在这个相对冷清的暑期档,取得了十多亿的票房,直逼上2022年电影票房前三,这是值得探讨的事情。这部看起来比较窄众的影片,讲述了殡葬师莫三妹在刑满释放不久后的一次出殡中,遇到了孤儿武小文,小文的出现,意外地改变了他对职业和生活的态度。

既然是华语电影难得一见的殡葬题材电影,《人生大事》难免被拿来同享誉世界的日本同题材影片《入殓师》做对比。除了题材相同,《人生大事》《入殓师》相同的地方还在于,都以这一题材表达了人的生死观。两者在人物关系上也有类似,主人公都同父亲有一些隔阂,父子的和解,都来自最后主人公为父亲入殓,含蓄隐忍的东方文化,在《人生大事》和《入殓师》中都被集中表现了出来。

《人生大事》的独特之处,在于放大了殡葬师莫三妹和孤儿小文的纠葛,让主人公与一个儿童成为故事的主线,实际上是巧妙地将殡葬这一主题放到了儿童的视野里,这是《人生大事》最为主要的设置,也体现了导演对这一题材最核心的认识。

《人生大事》中,殡葬师被比喻成“种星星的人”,影片导演刘江江解释说,这是因为影片采用了儿童视角,“‘种星星的人’是小文的话,也是我们的感觉。我小时候就听我奶奶说,地上少一个人,天上就会多一颗星星。中间在做这个事情的摆渡者,就是从事殡葬行业的人,所以‘种星星的人’是这么来的。”

关于“种星星的人”这样的表述,影片有两个核心情节。其一,莫三妹“残忍”地告诉小文,烟囱冒出的青烟就是姥姥,小文又在学校告诉老师,“爸爸”莫三妹是在天上种星星的人。其二,莫三妹的父亲一生从事殡葬行业,父子之间有隔阂。父亲去世后,莫三妹亲手为父亲入殓,骨灰装在奶粉罐子里,父亲给他留下了“最后一道题”,替无数人安排过体面后事的父亲,让莫三妹选择一种仪式为父亲下葬。最终,莫三妹想到了将其骨灰放进烟花,放上天空的办法。在烟花绽放的一刹那,莫三妹和父亲彻底和解。

烟囱里的青烟和绽放的烟花,形成了很好的呼应,代表了《人生大事》的生死观。“人生除了生死,其他都是小事。”这样的话听起来非常沉重。而在《人生大事》的表述里,死亡被以青烟、烟花的形式呈现,这让影片在表达殡葬这一题材时尽量看起来轻松,甚至有点浪漫。这种轻松浪漫的表述,应该就是《人生大事》的有意为之,这从影片的英文片名就可以看得出来。《人生大事》的英文片名是“Lighting up the Stars”,直译过来就是“点亮满天繁星”,这个英文片名,比较直观地体现了影片想要表达的意境。

相对沉重的殡葬题材,与《人生大事》相对轻松甚至浪漫的呈现方式好像不搭,但了解了影片导演刘江江的成长经历,就会发现这种呈现并不违和,甚至是对我们自身文化传统的忠实表达。刘江江在冀南的农村长大,爷爷和大爷都是木匠,偶尔会帮村里的人做棺材、操办丧事。小时候,刘江江家院子里就摆满了榆柳、桑槐、松木、柏木的各种棺材。十里八村谁家有丧事,刘江江的爷爷会去帮忙,因此刘江江对丧事即殡葬行业从小有感官的认识。在冀南方言中,人去世叫“大了”,事了拂衣去的那个“了”。一个“了”字,体现了一种对于去世的通达的表述。刘江江小时候对葬礼的认识,就是有机会看电影、看舞台表演,这些都是相对轻松、浪漫的丧事民俗形式。

小时候对殡葬行业的认识,以及长大后在电视台做了十多年农村栏目的经历,让刘江江积累了殡葬行业相当多的素材。作为平遥电影节创投项目的电影《人生大事》,最初的片名叫《上天堂》,故事背景也是华北地区的丧葬文化,只不过在找拍摄地时选择了南方。有故事的刘江江,决定了《人生大事》对于殡葬相对通达、轻松甚至浪漫的表达,比如影片中的活人葬礼。刘江江说:“中国人葬礼上做的一切,其实都是在治愈活着的人。”影片中给活人办葬礼这样看似荒唐的设定,其实是刘江江了解到的真实例子。有个老爷子终身未娶,孤身一人,他特别想看看自己的葬礼是什么样,就用积蓄给自己办了一场葬礼。这个看似闹剧的情节,其实也回到影片的主题,也是站在死亡终点,回溯你的人生应该怎么过得更有意义、你应该珍惜什么。

当然,将殡葬题材的某些环节表现得相对轻松,将严肃宏大的命题处理得相对轻巧,不仅仅需要幽默的桥段,也需要生活中真实的“悲”。在《人生大事》中,莫三妹和小文的处境都很困难。刑满释放的莫三妹从事殡葬一条龙服务,职业属性导致他需要承受种种偏见。

而小文失去了外婆,成了孤儿。幽默包裹下的悲,是《人生大事》的底色,轻松与幽默,只是影片诸多外衣的一种。

电影的片尾曲《种星星的人》改编自歌曲《送别》,由著名音乐人赵照改编词曲兼制作人,饰演莫三妹的朱一龙与饰演小文的杨恩又携手献唱,歌曲与影片的英文片名“Lighting up the Stars”相互呼应,表达了人们对生死相隔的亲人最浪漫化的怀念。歌曲从孩童视角出发,将殡葬师比喻成“种星星的人”,一改人们对殡葬从业者的刻板印象,突显出该片正视死亡、珍惜生活的积极含义。

作者简介:倪自放,资深媒体人,山东省签约艺术评论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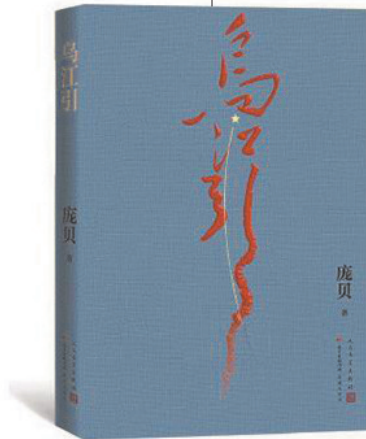
《人生大事》: 点亮满天繁星

◇倪自放

有人记得,他们就活着

——读庞贝长篇小说《乌江引》

◇李仲



毛泽东曾说:“没有二局,长征是很难想象的。有了二局,我们就像打着灯笼走夜路。”伟人所说的二局,就是庞贝长篇小说《乌江引》中涉及的中革军委二局。书中的一个密码战故事,揭示了隐蔽战线的胜利对于中国革命伟大进程的重要意义。

书中提到,自1934年10月中央红军离开苏区,到1935年10月长征结束,军委二局破译国民党军密码177本。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准确的情报,为毛泽东指挥红军一次又一次突破重围、绝处逢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那个生死攸关的危急时期,从1932年秋首破敌军密码算起,到1936年秋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军委二局破译的国民党军各类密码有860种之多。而小说中主导破译的曾勉、曹大冶、邹生,真实原型就是“破译三杰”曾希圣、曹祥仁和邹毕兆。

小说将主要笔墨集中于中央红军长征中北渡乌江和南渡乌江这一时间段,其中包括遵义会议、土城之战、四渡赤水等重大历史节点,让我们看到了另一个不曾熟悉的战场——中革军委二局的密码战,这是以往长征题材文学作品鲜有涉及的领域。所以,有评论认为,《乌江引》“丰富了红军长征主题的文学书写,拓展了军事文艺创作的空间”。

小说采用的“速写”和“侧影”组合以及双线结构形式,亦是值得称道的成功探索。前者是二局一位无名英雄的战地笔记“乌江引”,后者是何博士寻访战争年代从事秘密工作的外祖父下落的经历。其中战地笔记“乌江引”则是何博士寻找到的重要资料,是连接两部分的桥梁,历史与现实由此完美融合。那些湮没于历史深处的碎片化记忆,终于在作者手中拼接出一位位无名英雄的“速写”,形成了多角度多维度的“侧影”,从而真实立体地塑造出了奋战在隐蔽战线的红军英雄群像。

作者庞贝在解放军机要部门工作过,对隐蔽战线的重要性认识深刻,对从事密码破译工作的无名英雄非常敬重,因此使得《乌江引》对历史现场的复现,对英雄精神的探寻,具有了基于个体生命感悟的独特表达。

小说开篇,曾勉、曹大冶两人苦熬三天三夜破译刘建旭的密电,促成中革军委下令红军部队更改行进计划,向黔东南黎平前进,避免了钻入敌人的包围圈。而这次挑战身体极限的破译,对他们来说却是习以为常。书中描写了他们破译成功后的习惯动作,大喊一声:“破!”同时猛击一下桌子。这种淋漓尽致的情感释放,饱含着舍我其谁的自信和直冲云霄的豪迈。正是在这一次次的情感释放中,更加坚定了他们钢铁般的意志和必胜的信念。在土城之战中,曾勉、曹大冶、邹生兆一位腹痛,一位发烧,一位失眠,他们却依然在枪炮声中顶住巨大压力,就地侦听,就地破译,一昼夜就破解了敌军的密电。由于及时摸清了敌情,红军再一次摆脱险境,开始了一渡赤水。越来越严重的失眠头晕伴随了邹毕兆一生,难以忍受的折磨,终使他在1944年无法与敌军密码继续缠斗。

反观国民党方面,他们建立了庞大的无线电侦察机构,购置了最先进的破译设备,雇佣了外国密码专家,但对红军的密电一直“无从分析”。蒋介石命令手下的密码专家黄季弼破译红军密码,黄季弼在报告中强调了一番客观原因后表示:“职与全体人员再三讨论,咸认为无法办理此事。”其实,根本原因在于他们缺乏必胜的信念,不可能全身心地投入。

周恩来同志不仅对曾希圣领导二局取得辉煌战绩予以肯定,更是褒扬了隐蔽战线的将士们意志坚定,严守纪律,甘做无名英雄的奉献精神。出于保密的需要,二局的工作唯有中央和军委领导知道,他们的功勋不能宣传,受到自己人的误会也无法解释。干惊天动地事,做隐姓埋名人,他们只能是无名英雄。“有名的英雄不足奇,无名英雄更可贵”,这是曾希圣的一贯认识。直到病逝,他都严守纪律没有向家人透露一点自己的辉煌往事,心甘情愿做了一辈子无名英雄。

已经解密的长长的无名英雄的名单上,还有钱壮飞、张露萍、项与年、蔡威等等。其中蔡威被红四方面军政委陈昌浩称为能够准确提供敌情的“菩萨”,对截获的敌人密电,蔡威有时无需密码本就可以译出来,常常是边抄收边破译边上报。红军第三次过草地时,他不幸因重疾去世。由于工作性质原因,他很早就和家里断了联系,直到1985年家人找到他的遗骸,家人烈属的身份最终得以确认。1986年,徐向前元帅为其题词“无名英雄蔡威”。

“只要有人记得,他们就还活着”,这是庞贝写作《乌江引》的初衷。当年,红军南渡乌江后,当地百姓自发掩埋了许多红军烈士的遗体,其中就有二局的烈士。百姓们不知道他们的名字,但知道他们为谁而死。今天,这些无名英雄仍然还活着,《乌江引》就是对他们最高的礼赞与致敬。

作者简介:李仲,青岛琴岛作家协会会员。

《文艺评论》征稿邮箱:
zaobaofukan@126.com
请在标题中注明“《文艺评论》
投稿”。(2000字+短视频评论)



「文化青岛」
扫码关注